

国际关系学科起源动因探析

——基于对英国和瑞士的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分析

杨紫茵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学科的首个教席“伍德罗·威尔逊教席”和首个国际关系研究院“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学院”的成立过程揭示了欧洲国际关系学科起源的三个相互作用的动因:环境、主体和资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寻找维护和平方法的理想主义思潮刺激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出现;慈善家和基金会都意识到培养国际关系人才的重要性,资助了知识生产制度的创立,为知识生产活动提供了资本;国际联盟成立后也对国际关系人才提出需求。在此背景下知识分子投身于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建设当中,构建起有制度可依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梳理欧洲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可以发现,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是社会现实与知识制度化双向互动的过程,社会发展是刺激学科知识创造的重要因素,而成立后的专业知识体系所生产的国际关系知识又将被运用到现实政治当中,影响社会现实。

关键词 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学科史 英国 瑞士 学科建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 国际联盟 知识分子网络 基金会

* 杨紫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本文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国际组织后备人才培养项目”[项目编号:留金选2019(133)号]资助下完成。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自从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Wales, Aberystwyth)^①设立第一个国际政治教席——伍德罗·威尔逊教席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至今已逾100年。^②然而,一些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有所发展,以此反驳国际关系学科起源于1919年的说法。基于国际关系学科起源的不确定性,这些学者将国关学科的起源称为“1919年的迷思”(the myth of 1919)。的确,直至1919年,国际关系才开始拥有属于该学科的独立机构和制度,使其成为一门有形的“学科”。因此,有关“1919年迷思”的观点始终存在争议,甚至使部分学者对国际关系是否是一个学科产生怀疑。在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国际关系一般被认为是政治学科的子学科;而在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国,国际关系一般被视为是一门独立学科。^③

从词源与词义来看,“学科”(discipline)一词可以总结为两层含义:一是知识的分类,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知识进行归纳和分类;二是一门知识背后的学科规训制度,即知识的社会制度化过程。^④因此,“学科”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具有严格的和普遍认受性的生产规范的一门知识。由此,自1919年于英国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成立的国际政治教席和开展相关课程开始,国际关系学科规训制度的雏形在欧洲渐成,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知识

① 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Wales, Aberystwyth)于1893年和北威尔士大学班戈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North Wales, Bangor)、南威尔士和蒙茅斯郡大学加的夫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South Wales and Monmouthshire, Cardiff)组成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Wales),是仿照伦敦大学创建的大学联盟。2007年,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从威尔士大学独立出来,并改称为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参见 Gareth Elwyn Jones, “The Welsh Universities and Devolution,” *The Welsh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14, No.1, 2007, pp. 21-42; “History of Aberystwyth University,” *Aberystwyth University*, <https://www.aber.ac.uk/en/about-us/history/history/>, 2023-09-15。本文中涉及该校2007年以前的名称统一为“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

② 从狭义上讲,在学科建制内,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等领域的具体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存在差异,许多大学甚至会同时开设这些学系、专业或学位课程。但是,由于这些表述彼此间也存在包含关系,因此,本文选择“国际关系”一词以概括这一知识体系,泛指关于超国家层次上国家间或非国家行为体交往及其行为衍生的相关议题的研究。

③ Knud Erik Jorgensen, eds., *Reappraising European IR Theoretical Traditions*,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 71-75.

④ 该词的英语词源一半来自法语“dicepline”,最早于公元1100年时指“大屠杀”,逐渐发展为“训导”“惩罚”,直到1370年才接近现代含义的“学习或知识的分支”;另一半则源自古拉丁语的“disciplina”,其含义包括“教导”“指导”“训练”“研究的分支”“有秩序地进行道德训练”等。参见“Disciplin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ttps://www.oed.com/view/Entry/53744?rskey=wUQP0l&result=1#eid>, 2021-04-21。

体系逐渐发展成一门有形的学科。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一个学科领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相对自主和独立的社会(智识)空间,根据该领域自己的规则组织,承认特定资源的合法性,并以不同的机构和个人职位构成。^①由此来看,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除了有独立的智识空间以外,还需要有制度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在欧洲从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脱离,形成独立的学科建制,国际关系学知识生产得到规范化管理,学科知识和学科建制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成长。费孝通认为,一门学科机构需要包括五个部门,即学会、专业机构、大学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和专门出版机构。^②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方文认为,学科制度包括学科制度精神和学科制度结构两个方面,前者指规范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后者则是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由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职业研究者、研究结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流通和评价体系;学术基金资助。^③总的来看,“学科建制”主要是指支撑知识生产过程的三种制度:(1)研究与创新制度:支持学者或相关研究人员从事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管理方法,形成学术共同体,包括学术道德规范、行政体系等;(2)教学与培养制度:依托学校、科研机构 and 智库等实体机构设立,旨在培养国际关系实务与科研人才的制度,如课程、科系设置等;(3)出版与研讨制度:以出版社、学会、科研机构为单位进行的国际关系学术成果出版和交流活动,具体表现形式包括期刊发行、书籍出版和研讨会开展等。

本文以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史为切入点,旨在探究为何国际关系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一门规范化的独立的知识生产体系这一问题。本文以最古老的国际关系教席所诞生的英国国际关系学科和最古老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学院”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分析,分析所用的一手

^① Bourdieu Pierre, “Le Champ Scientif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Vol.2, No.2, 1976, pp. 88-104, quoted from Nicolas Guilhot, ed., *The Inven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1954 Conference on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8.

^② 费孝通:《略谈中国的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6页。

^③ 方文:《学科制度和社会认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7页。

档案材料主要来源于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学院。通过探索欧洲国际关系学科教学与培养制度形成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成立,知识分子、国际联盟和资助者三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促成了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在战间期的20年间逐步成型。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彼得·伯格(Peter Berger)和德国康斯坦茨社会学荣休教授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kemann)指出,人们会根据特定的活动发展出一套相应的知识,社会又将这类知识客体化,产生相应的客观科学,继而发展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并将这套知识体系传承下去。人们学习这套知识后,将这样的“客观真理”内化为主观现实,影响了人类的社会行为。^① 国际关系学科的形成正是由于受到政治现实刺激,通过建立学科建制的知识制度化过程,成立了系统的专业知识体系,而其中所生产的国际关系知识又将被运用到现实政治当中,影响社会现实。从国际关系学科起源来看,社会发展是刺激学科知识创造的重要根据,是学科知识转化为现实存在的实践基础,也是学科制度化形成的关键因素。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是社会现实与知识制度化双向互动的过程,国际关系学科的建制形成过程可归纳为“三因素机制”——环境因素、主体因素和资本因素三因素的共同作用机制。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奠定了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创立的“1919年迷思”

关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何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主流观点认为国际关系学科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后诞生的,以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设立的首个国际政治学教席为标志。^② 英国历史学家、曾任威尔逊国际政治教席教授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在《20年危机》中提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很少人关注国际事务,第一次世界

^① [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9—85页。

^② 持近似观点的国内学者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页;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228、291页;钟飞腾:《百年大变局、中国与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东亚评论》2019年第1期,第20页等。

大战后人们开始反对秘密条约,标志着人们开始需要国际政治知识的普及,因此诞生了一门新学科——国际政治学。^① 卡尔认为,国际关系学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学者们创立这门学科的初衷是避免再次发生同类型的灾难,这种乌托邦的意识和愿望奠定了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方向。^② 卡尔在该书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学者的乌托邦主义进行批判,促使国际关系理论转向现实主义。不过,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不少学者对卡尔的说法进行反思,一方面,从思想史上质疑“第一次大辩论”的真实性;^③另一方面,对国际关系学科创立的观点提出批评。

20世纪90年代中期,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教授肯·布思(Ken Booth)首次提出了这一批评。他指出,在“强有力的创立性迷思”下,所谓在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国际政治学系成立75年的这一说法是被修饰和夸大的。他解释道,使用“迷思”一词表明该说法并非全属虚构,而是半真半假的,这样的迷思只为塑造共同意识,引起特定群体的情绪,使他们感到希望和恐惧,也有助于学科的规范化。他认为,特别是关于威尔士大学伍德罗·威尔逊讲席资助者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和爱德华·卡尔两人之间观点差异和紧张关系为国际关系学科创立的迷思增添了戏剧色彩,^④让冷战时期迷茫的国际关系学生们以他们为研究方向,而以戴维斯的理想主义和卡尔的现实主义的对抗则推动了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而这两人的对抗结果被简单理解为卡尔获得胜利,乃至在战后40年间,许多人以为国际政治是关于国家间的“权力政治”,并且只能从现实主义角度理解国际政治学。但是,事实并不全然如此,

① [英]E. H. 卡尔:《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10—11页。

③ Peter Wilson, “The Myth of the ‘First Great Debat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4, No.5, 1998, pp. 1-15; L. M. Ashworth, “Did the Realist-Idealist Great Debate Really Happen?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5, No.1, 2002, pp. 33-53.

④ 戴维·戴维斯设立伍德罗·威尔逊国际政治教席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建立国际力量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爆发。因此,1936年威尔士大学展开对伍德罗·威尔逊教席新一任人选讨论时,戴维斯希望能选择没有学术研究背景但是热衷于宣传国际联盟的W.阿诺德·福斯特(W. Arnold-Forster),因为他与自己一样对建立国际政府充满热情。尽管戴维斯通过演讲和书信等方式试图说服委员会提名阿诺德·福斯特,但伍德罗·威尔逊咨询委员会最终决定提名学术背景较强的历史学家C. A. 麦卡特尼(C. A. Macartney)和当时在外交部任职的爱德华·卡尔。戴维斯因此感到失望,并指责委员会无所作为。参见 Brian Porter, “Lord Davies, E. H. Carr and the Spirit Ironic: A Comedy of Erro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1, 2002, pp. 77-96.

现实主义并非战胜了理想主义。^①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布赖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借鉴肯·布思的说法,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理想主义范式正是反映了学科的创立性迷思,以至于最常见的表述便是国际关系学科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这并非真正的国际关系学科史。他指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关系研究便作为美国政治科学的次领域缓慢发展。1903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成立之初就有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管治等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议题的讨论。他认为,重新审视学科史以发现真实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脉络,消除错误认知,才有助于国际政治研究的发展,因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二分法不仅是人为创造的,更扼杀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的想象空间。^②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其他学者也曾提出对国际关系学科起始点的怀疑。巴里·布赞和布里斯托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认为,重新评价国际关系学缘起的历史认识是必要的,英美国际关系学是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惧而诞生的说法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浪漫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迷思,事实上,国际关系学的根源要远比这一神话深刻。^③ 2011年,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杰明·德·卡瓦略(Benjamin de Carvalho)等发表文章,对教科书中1648年和1919年国际关系起源迷思的批判,论述了这一神话般的描述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④ 布赞和乔治·罗森认同卡瓦略的说法,并基本接受国际关系起源的迷思这一说法,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既不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开端,也不是国际关系学科的起始点。国际关系研究忽视了19世纪的全球转型,反而在各

① Ken Booth, "75 Years on," in Steve Smith et al.,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28-331.

② Brian C. Schmidt, "Lessons from the Past: Reassessing the Interwar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No.3, 1998, pp. 433-459.

③ [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1页。

④ Benjamin de Carvalho et al., "The Big Bangs of IR: The Myths That Your Teachers Still Tell You about 1648 and 1919,"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9, No.3, 2011, pp. 735-758.

类教科书中将值得批判的 1648 年和 1919 年视为不容置疑的转折点。^①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巴里·布赞在 2019 年也再次提及国际关系学科起源于 1919 年的迷思,他们认为关于 1919 年创立这一点是“半真半假”的。因为过分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并没有展示出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等一系列思想对国际关系学科创立的影响,因此,讨论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不可以忽视国际关系已在 19 世纪的各类思想争辩中扎根这一事实。^②

学界关于国际关系学科起源的“1919 年迷思”并不仅仅在于学科精神层面,更关乎学科制度层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乔·安妮·潘伯顿(Jo-Anne Pemberton)认为,1919 年不能认定为国际关系学科创立的元年,原因是在欧洲和北美的学术机构中早就开设了国际法和外交史的相关课程。不过,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国际关系学是在战间期发展为一门新的知识事业。^③ 塔夫茨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霍华德·马尔乔(Howard Malchow)指出,虽然学者辩称国际关系学的学术起源可以追溯回 19 世纪末美国成立的政治学学科或国际法学,又或称在战间期国际关系讨论中,那些表现突出的学者早在 1919 年前就已经发表过相关成果,但是,以制度创立的叙事方式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自觉意识的形成还是有意义的。^④

虽然关于“1919 年迷思”的讨论意味着国际关系学科起源的基准时间可以追溯至更早,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创建标志着国际关系学科知识生产体系成型这一观点是受广泛认可的。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创立背后主要受到环境、主体和资本三方面共同推动,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有独立学科建制的学科在战间期逐步成型。

①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53-55.

②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64-66, 82-84.

③ Jo-Anne Pemberton, *The 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 One Cold-Blooded Idealists*,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pp. 2-3.

④ Howard LeRoy Malchow,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6, pp. 22-23.

二、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形成的环境动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交、军事等事务由特定的行动者执行,在行动者之间存在特定的术语和知识认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知识有了普及的必要性。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和哈佛大学教授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指出,国际体系中的战争或经济大萧条等世界性历史事件会刺激人们寻求新思维和新规范。^①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奥利·维弗尔(Ole Waever)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特点在于外部解释决定内部解释,即国际关系现实对国际关系学科内部发展产生影响,这和一般科学社会学视角下的科学发展逻辑是不同的,外部解释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并不只提供了学术环境,还影响了学科内的知识生产方向。^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结束,刺激人们对“战争与和平”这一议题的探索,战后,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学术研究提出维护国际和平的方法,英国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积极倡议成立国际联盟。国际联盟除了对国际关系学的知识生产影响深远,更是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形成的主要推手。

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而言,国际联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由民主国家主导、维护的世界秩序,实际上,国际联盟的最紧迫任务是欧洲的战后恢复问题。因此,当时一些国际联盟秘书处成员提议,作为首个政治组织,国际联盟应该促进知识分子合作。1919年12月,国际联盟第三次会议指出,国际联盟应该鼓励和指导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创设。^③ 为了进行欧洲战后恢复、平息冲突等相关研究和教育,国际联盟建立了国际组织如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ICIC)、国际知识分子合作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IIIC)等,这些组织负责管理讲授国际关系课堂的学校和机构,鼓励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8页。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第58页。

③ Jo-Anne Pemberton, *The 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 One Cold-Blooded Idealists*, pp. 8-9.

其中,国际知识分子合作研究所试图建立学校间和专家学者间的交流网络,并帮助他们发展标准化的教程。^① 1936年,日内瓦高院的创始人威廉·拉帕德(William Rappard)曾收到国际知识分子合作研究所举办国际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的邀请,出席该会议的还有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利奇(William Beveridge)、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英国国际关系学家查尔斯·曼宁(C. A. W. Manning)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 Zimmern)。^② 如果没有国际联盟的直接帮助,欧洲各国的国际关系知识分子联系便不会那么密切,英国国际关系学科制度的建设也较难在欧洲大陆引起广泛影响。

曾任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现任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研究员的戴维·麦克法迪恩(David Macfadyen)等指出,国际联盟是首个全部由国际公务员组成的组织,其秘书处也是首个向女性提供平等工作机会的组织,加之其对国际公务员的管理方式新颖,被视为是战后的“黄金实验时期”。^③ 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学院教授诺曼·斯科特(Norman Scott)指出,由于国际联盟没有足够的资源为其职员建立培训学院,而且进行内部培训也可能会导致他们的政策观点向国联的立场倾斜,国联秘书处的成员意识到为各国政府招募而来的公务员提供专业训练的必要性。^④ 早在1921年,国联秘书处成员和日内瓦大学的代表曾讨论由国际组织代表或秘书处成员在大学里开设课程的问题。当时,国际组织在日内瓦成立,于是在这里开展了国际关系的短期课程,参与者主要是来自美国的研究生。随后,在1923—1924年间,国际联盟大会催促各国参与国际联盟方针和工作的相关培训,特别是培养重视通过国际合作组织国际事务的新一代。^⑤ 1925年起,当时任知识分子合作研究所国际事务主管、牛津大学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教授的阿尔弗雷德·齐默恩^⑥在日内瓦大学举办了

^① Torbjorn L.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54.

^② Document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Letter), Jiri F. Vranek, To Prof W. Rappard, January 30, 1936.

^③ David Macfadyen, et al., *Eric Drummond and His Legacies: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Beginnings of Global Governance*,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p. 104-105.

^④ Martine Brunshwig Graf, et al.,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1927-2002*,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2002, p. 27.

^⑤ Ibid., p. 29.

^⑥ 齐默恩也是首位出任威尔士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国际政治教席的教授。

国际事务的国际暑期学校,即日内瓦国际研究学校(Genev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学生部分来自齐默恩学校(Zimmern School)——由齐默恩担任院长并亲自授课。1927年起,想上齐默恩学校常规学年制课程的学生需向日内瓦高院递交申请。^①在这一时期,日内瓦的国际关系学科的专门研究院、学校、讲座、课程陆续展开,这一定程度上是受国际联盟对培训国际公务员的需求刺激。

三、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形成的主体动因

欧洲知识分子网络促进和巩固了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建设。知识分子网络一直是知识社会学中的关注点之一。知识分子网络也可以被理解为“认识论共同体”,意味着同一知识领域的知识分子相互联系,且对该群体有认同感。知识分子网络成员并不仅是指狭义上的大学教授,还包括许多“业余知识工作者”。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指出,自中世纪以来,有学者同时担任统治者的顾问、士官等,如路易十四时期的历史学家让·拉辛和路易十五时期的历史学家伏尔泰等。17世纪后,大学教授成为一个独特群体,特指专职从事知识的研究工作的一种职业。^②除了学者、教师和记者等传统知识工作者以外,“业余知识工作者”如外交官等也对特定领域知识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他指出,在19世纪,许多外交官会在空闲时间兼任学者,如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同时也是一名汉学家。业余知识工作者和职业学者之间是模糊的知识分子形象。^③

欧洲国际关系学科成立之初的主要参与者如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爱德华·卡尔,以及日内瓦高院的创办人威廉·拉帕德和保罗·芒图(Paul Mantoux),他们有个共同特征即都有外交实践和学术的双重工作经历,基本继承了欧洲知识分子传统特质。首位出任伍德罗·威尔逊教席的教授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期间(1912—1915年),曾积极倡议成立

① “Document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Letter), To Mrs J. D. Hunter,” May 6, 1931.

② [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学(上卷):从古登堡到狄德罗》,陈志宏、王婉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0页。

③ [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汪一帆、赵博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0—264页。

一个国际联盟,并帮助建立国际联盟协会(the League of Nations Society)。^① 1915年,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离任后,在劳合·乔治联合政府建立的重建部工作,不久便转至外交部政治情报部门,主要研究经济政策和战后重建计划。在这一部门工作期间,他起草了一篇描述“国际联盟”主要特点的备忘录。1917年1月,齐默恩起草的备忘录被英国时任副外交大臣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连同其他关于国际联盟的计划书一起被整理成一份总备忘录,这份文件后来被称为《塞西尔草案》(Cecil Draft)。^② 齐默恩的建议辗转地影响了威尔逊对国际联盟的构思,间接地推动了国际联盟的成立。和齐默恩的经历相似,卡尔在成为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关系教授前,已于英国外交部工作了20年,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曾代表英国参与巴黎和平会议,并自1933年开始在外交部负责国际联盟事务,也曾参与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会议。正是因为他在国际联盟的外交实践经历,伍德罗·威尔逊教席的评审委员会最终选择请他出任国际关系教授一职,但是,当时的评委们并不了解卡尔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不知道卡尔早已对国际联盟失去信心,所以他们并未料到他们最终选择的是一位与伍德罗·威尔逊教席设立理念相悖甚远的人。^③

日内瓦高院的创办人之一威廉·拉帕德是国际联盟秘书处托管部门的主管,可谓是国际联盟和学术研究之间的桥梁,曾担任国际红十字会成员,具有丰富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1913年,拉帕德获得了日内瓦大学经济史的教席。他曾于1917年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进行游说,提出将谷物运输至瑞士,又提议美国宣誓承认瑞士的中立性。此后,拉帕德与威尔逊曾于华盛顿和巴黎进行多次会面,在会面中威尔逊曾透露建立国际联盟的想法。拉帕德敬佩威尔逊的智慧和眼界,因此,非常支持国际联盟的成立,也同意在国际联盟中担任秘书处职务,后来他又创立了日内瓦高院,将其一生奉献给了威尔逊的

① 国际联盟协会成立于1915年春天,其成员大都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代表成员如英国外交家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协会成立目的是倡议在战后成立一个可以削弱国际关系无政府特质的国际组织。参见 Torbjorn L.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 250.

② Paul Rich, "Reinventing Peace: David Davies, Alfred Zimmern 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Interwar Brita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1, 2002, pp. 119-120.

③ Brian Porter, "Lord Davies, E. H. Carr and the Spirit Ironic: A Comedy of Erro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6, No.1, 2002, pp. 80-82.

国际关系构想。^① 一直以来,拉帕德活跃于学术界和国际事务领域,他的工作经历为他积累了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和人脉,使他能获得学术界和政府方面的认可,也因此能够筹集足够资金建立日内瓦高院。拉帕德与齐默恩夫妇有着深厚的友谊。根据日内瓦国际关系与发展研究高等学院现保存的档案,拉帕德与齐默恩在1928—1938年之间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书信语言采用英语和法语,书信内容包括与日内瓦高院的教学合作、对国际时局的讨论、新发表的文章分享和引荐相熟的学者。日内瓦高院首任院长保罗·芒图与拉帕德则是在巴黎和会上相识的,也同在国联秘书处共事。1912年,芒图获得了伦敦大学现代法国史教席,其博士论文《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是经济史研究的经典。由于芒图与法国政府的翻译员为好友,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劳合·乔治任命为各类正式与非正式会议中英法渠道的联系人。^② 1919年3—6月,芒图作为第一翻译参与巴黎和会,为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和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进行翻译。1920年始,芒图出任国际联盟秘书处政治部门主管,在任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也对国联运作与实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回顾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过程,可以发现,参与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创建的知识分子都拥有多样化的职业背景,在学术和外交领域都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基础,同时也有着通过国际力量维护和平的愿望。他们的外交实践经历成为了他们参与国际关系学科形成的关键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创建目标是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国际关系学和培养国际事务人才以维护战后和平。欧洲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分子网络不仅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还囊括了来自经济学、历史学、国际法学、哲学等多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彼此了解,经常共同出席学术活动和讨论。1934年8月,拉帕德便曾参与国际联盟组织的国际关系课程项目,并以《国际联盟中的小国》为题发表演讲,该活动的演讲者还包括美国国际法学家曼利·赫德森(Manley Hudson)、历史学家古奇(G. P. Gooch)、齐默恩、《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的作者诺

① Martine Brunschwig Graf et al.,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1927-2002*, p. 48.

② *Document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Biography)*, (Unpublished) Étienne Mantoux, *Mon Père Paul Mantoux*, pp. 57-58.

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在活动中,这些知识分子都发表了对国际联盟工作的看法,普遍对国际联盟抱有较高期待,肯定了国际合作对维持和平的作用。知识分子网络中的成员向其他成员推荐自己的人脉关系,进一步扩大该领域知识分子网络的体量,尽可能使每一位成员都在学科建制内各抒己见,强化了该领域的知识创造能力。

四、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形成的资本动因

欧洲的慈善公益事业传统由来已久,中世纪的欧洲教会便已开展慈善事业,以缓解社会贫富不均的状况。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The Elizabeth Poor Law),扩大了教会资助的对象,除了弱势群体,还包括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学学者。随着英国人移民至美国,慈善公益事业和思想也传播到新大陆。慈善和公益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简单的救济,而后者则是以解决问题根本为目标进行资助。^①对于欧洲国际关系学科来说,资助者是使学科建制落实的强心针。来自资助者们的物质支持是使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式愿望转化为社会事实的必要条件。不过,资助者对于学科制度的构想塑造了制度的精神基础,甚至会直接影响学科思想的创造。为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提供资本的资助者主要有个人和基金会两类。

对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提供资助的个人慈善家大多都如爱德华·卡尔所理解那般,是在战后理想主义(卡尔称作“乌托邦主义”)愿望的刺激下,决定在大学中资助国际关系教席、培养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他们尤其希望加强关于和平或国际联盟的研究。在英国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资助创立首个国际政治教席的戴维·戴维斯勋爵(David Davies)的家族有慈善公益传统,一直都是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的捐助者。戴维斯本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于西线服役,因在战争中目睹过荒芜和屠杀,深受震撼,所以,希望能够阻止这样的灾难发生。1919年,他和姐妹温德林·戴维斯(Gwendoline Davies)和玛格丽特·戴维斯(Margaret Davies)共同资助

^① 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美国百年公益发展的启示》,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1—24页。

2万英镑以在威尔士大学阿伯里斯特威斯学院成立一个教席,进行国际政治的系统研究,为国联提供人才支持,推广和平。^① 1924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设置了欧内斯特·卡斯尔(Sir Ernest Cassel)国际关系教席。^② 1932年,由于赞助人的更换,该教席更名为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教席(Montague Burto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③ 蒙塔古·伯顿(Montague Burton)爵士以制造成衣起家,在1930年资助牛津大学成立国际关系教席。^④

在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学院得到亚历克斯·巴顿、日内瓦州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三方资助,最终于1927年成立。前英国驻伯尔尼公使之女、时任英国驻日内瓦总领事之妻亚历克斯·巴顿(Alex Barton)曾在国际联盟成立初期组织沙龙,^⑤让国联秘书处的年轻外交官可以有机会相聚一堂,连国联创立人之一、曾任英国副外交大臣的罗伯特·塞西尔也对巴顿的沙龙赞赏有加。在这个沙龙上,拉帕德和芒图建立了深厚友谊。沙龙举办的地方是巴顿的别墅——拉穆尔别墅(Villa Lammermoor)。当时国联选定在日内瓦开设总部后,本是希望在此建立万国宫,但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捐助修建国联图书馆,巴顿不同意损害别墅周边环境。最终,瑞士联邦政府和日内瓦政府决定选择阿里亚纳公园(the Parc Ariana)作为万国宫的地点,而在巴顿去世后,日内瓦政府把拉穆尔别墅给予日内瓦高院作为校址沿用至今。^⑥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想效仿华盛顿1913年建立的政府研究所而在日内瓦建立“国际关系所”,为国际联盟服务,为国联的工作背书,对裁军、经济金融、人道主义等议题进行分析,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国家行为。自1925年7月起,洛克菲勒基金会[具体上是劳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Laura

① Brian Porter, "Lord Davies, E. H. Carr and the Spirit Ironic: A Comedy of Errors," pp. 77-78.

② Arlene B.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292.

③ 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10页。

④ Jan Stöckmann, *The Archit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ilding a Discipline, Designing the World, 1914-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85-86.

⑤ 亚历克斯·巴顿和国际联盟的首任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Sir Eric Drummond)都是英国人,因此她与德拉蒙德及其妻子有着深厚的友谊。

⑥ Martine Brunschwig Graf, et al.,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1927-2002*, pp. 24-25.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Fund),该基金会于1929年1月并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就积极联系日内瓦州政府和瑞士联邦政府,讨论创建促进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并表示愿意每年向该研究所提供12.5万法郎,为期五年。在这一过程中,拉帕德与洛氏基金会主任比尔兹利·拉默尔(Beardsley Ruml)进行过会谈。^①不过,从日内瓦高院1927—1956年的收支表来看,洛氏基金会对日内瓦高院的资助要远超预期。洛氏基金会在1927年兑现了承诺,捐赠了15.2万法郎,虽然第二年有所减少,但是,1930年的捐赠额高达43.8万法郎。^②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美国的慈善基金会资助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研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知识活动有所影响。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曾在资助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时,质疑资助汉学家和宋史研究者的现实意义。^③同样的情况也曾发生在日内瓦高院当中,若不是拉帕德的据理力争,洛克菲勒基金会将对日内瓦高院的知识活动和决策行为施加更大的影响。在日内瓦高院成立后不久,拉帕德便与其主要资助者之一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洛氏基金会希望日内瓦高院与基金会展开合作研究项目才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拉帕德不同意甚至提出辞职。在拉帕德的极力争取之下,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同意继续给予支持,只是资助金额将会逐年减少。^④从日内瓦高院1927—1956年的收支表上可见,在1940年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日内瓦高院的资助从30万法郎减至11万至20万法郎不等,甚至在1949年以后资助金额只有9千法郎到2万法郎不等,还出现资助中断的情况。^⑤不仅基金会会对学科建制提出意见,个人慈善家也曾试图影响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发展。1936年,戴维斯就曾试图表达对任命爱德华·卡尔作为威尔逊教席教授的不满,希望能够选择与自己一样对建立国际政府充

① Document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Etudes Interantionales."

② Document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De-penses Et Recettes, 1927-1956."

③ [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第247—249页。

④ Martine Brunschwig Graf, et al.,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neva 1927-2002, pp. 71-75.

⑤ Documents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De-penses Et Recettes, 1927-1956".

满热情的阿诺德·福斯特(W. Arnold-Forster),并尝试通过演讲和书信说服伍德罗·威尔逊咨询委员会,但最终没有改变委员会选择学术出身较好和政治经历丰富的卡尔。^①

结 语

国际关系学科史研究在近年国际关系后实证主义的推动下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国际关系学科史大致分为学科思想史和学科建制史两类,而目前已发表的成果多侧重于学科思想史研究,如反思学科的“大辩论”叙事,较少通过学科制度史的角度梳理国际关系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学科制度史反映了知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过程,知识体系的形成源于社会发展,而学科知识有效传承随着时间推移反馈并构造了社会现实。学科知识的蓬勃发展依托于学科制度的逐步完善,因此,学科建制史研究有助于了解一门学科缘起与发展方向,也有助于思考学科争辩更迭的制度原因。

基于英国国际关系教席的形成和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等学院的成立两个案例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欧洲国际关系学科是在环境、主体和资本的“三因素机制”作用下逐渐建立起学科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了人们杜绝战争、维护和平的愿望,而一些知识分子将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国际合作力量,特别是国际联盟。英国国际关系教席的资助者们和瑞士日内瓦高院的创办人们都支持国际联盟的成立,肯定国际联盟对于战后恢复的作用,并相信培养国际关系研究学者和国际外交人才是必要的。英国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培养的学者们和活跃于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国际联盟的外交官们建立起了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分子网络,强化了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的意识,为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形成增添了动力,其多元化的背景也为欧洲国际关系学思想奠定了多学科基础。国际联盟在国际关系学科制度起源的过程中有着复合作用。它既是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又是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物质基础。它代表了

^① Brian Porter, "Lord Davies, E. H. Carr and the Spirit Ironic: A Comedy of Errors," p. 80; Brian Porter, "David Davies: A Hunter after Pea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5, No.1, 1989, pp. 27-36.

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也是国际关系人才培养的需求方,又为欧洲国际关系学科提供了学术资源和环境。正是这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成立,使国际关系学在欧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仅是政治科学下的子学科。

布鲁塞尔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名誉教授、日内瓦高院教授莫里斯·布奎恩在1959年的文件中提到:“随着人们对世界日益关注,32年前成立的日内瓦高院学生之间及他们与教授之间建立的联系为国际关系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允许观点的对抗,形成更大的思想,培养了理解和客观的精神,对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正面影响。”^①不仅日内瓦高院,英国国际关系教席的成立更是如此。欧洲国际关系学科建制的成立,有利于学科知识的规范化管理,为国际关系学科思想提供了稳定且良好的学术氛围,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积极发展。

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谈到历史学科的定位时表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可是历史学与历史不同,它是一个批判性的学科,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独立思考过去与现实的关系。^②国际关系学也与国际关系不同。国际关系包含了国际层面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交往时发生的事件,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主体是国际关系,但是,它本质上也应是一个批判性的学科,基于社会事实总结知识,再以知识影响社会现实,将过去与当下联系起来。

^① Maurice Bourquin, L'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 De Geneve, April 10, 1959, p. 8.

^② [美]帕特里克·格里:《历史、记忆与书写》,罗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